

被冤枉的海蒂？ ——《亚当·比德》的女性主义思考

周颖

内容提要：如何解读《亚当·比德》中的海蒂，历来众说纷纭。为海蒂喊冤，乃英美评论界的主流声音，甚至有论者视她为“逾矩破规”者。文章通过分析乔治·爱略特时代风行于中等阶层和底层社会的完美太太理念，并从女性主义的视角切入考察美的观念，思考海蒂如何陷入自恋深渊，造成了对他人、对真实世界的排斥。无情或缺乏感受，是酿成海蒂悲剧的一个主观原因。爱略特有鲜明的道德关怀，却没有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对海蒂口诛笔伐，也没有将她简化成文学作品中惯常出现的女性类型如贞女、慈母或荡妇等。海蒂并不因其“小”而变得僵硬与扁平，反而是小说刻画得最丰满的女性人物。作者深知海蒂的悲剧有个体的责任，也有不可忽略的社会原因。

关键词：《亚当·比德》 完美太太 自恋 海蒂 个体与群体的悲剧

中图分类号：I5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529(2021)04-0119-12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英美室，北京 100732

DOI:10.16430/j.cnki.fl.2021.04.011

Title: Has Hetty Been Wronged? A Feminist Reading of *Adam Bede*

Abstract: Opinions vary on how to interpret Hetty in *Adam Bede*. One of the prevailing views among American and British critics is that she has been wronged by the author. Some reviewers even depict her as a heroine who breaks the mold of convention. This paper, through an analysis of the notion of “perfect lady” popular among the middle and bottom classes in the age of George Eliot, and through a feminist investigation of the idea of “beauty,” intends to show how Hetty sinks into the abyss of narcissism and isolates herself from other people and the real world. Apathy, or lack of feeling, is one of the subjective reasons which breeds the tragedy of Hetty. George Eliot has deep moral concern, yet she does not simplify Hetty into the usual stereotypes of women in Victorian novels: a chaste woman, a loving mother or a wanton. In spite of her “smallness,” Hetty is not a rigid or flat figure. She remains the most vivid female character throughout the novel. The author makes clear that Hetty’s tragedy is brought about both by individual responsibility and social reasons.

Keywords: *Adam Bede*, perfect lady, narcissism, Hetty, individual and social tragedy

Author: Zhou Ying, Associate Professor, Institute of Foreign Literatur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China. Email: zhouying@cass.org.cn

乔治·爱略特(George Eliot)的长篇小说《亚当·比德》(*Adam Bede*)一经问世,风靡英伦,六周内售罄,其在当时受欢迎之程度,绝不亚于今天的韩剧和美剧。故事发生在1799年一个叫“干草坡”的英国村庄里:木匠亚当·比德爱上了挤奶女工海蒂;海蒂不大看得上亚当,却对乡绅少爷亚瑟视同儿戏的追求心存幻想,与其暗通款曲,直到亚当发现隐情,从中干预,她才如梦初醒;失恋后的海蒂接受亚当的求婚,却在筹备婚礼之际发现自己再无法遮掩早有身孕的事实,惶恐之下离家出走,前往军营寻找亚瑟;不料军队换防撤离,不知亚瑟去向的她中途产子。在性道德严苛的维多利亚时代,未婚生子乃天大丑闻,这样的女子在社会上形同妓女,遭人唾弃,注定要受孤立和隔离。海蒂不敢面对耻辱,偷偷将婴儿弃于林中;待她良心发现,回去找寻,为时已晚,孩子已浑身冰冷;海蒂被捕入狱,审判时拒不回答任何问题,被判弑婴罪;亚瑟在这生死之际匆匆赶到,携来一纸死罪豁免书;海蒂流放他乡,不幸染疾身亡。

海蒂这个人物,历来众说纷纭。她是一个 *fallen woman* 的形象,译成中文可以称作“堕落女”或“失足女”;结局凄凉、下场悲惨,是这类女子在维多利亚小说中的常态。如果将《亚当·比德》同18世纪小说稍作比较,就能见出其间道德与风俗的变易。以笛福(Daniel Defoe)的《摩尔·弗兰德斯》(*Moll Flanders*)为例。摩尔当了十二年妓女,先后五次嫁人,为了敛财与各种人私通,姿色渐衰后以偷盗为生,成为盗贼窝里的明星级人物。虽然作者对女主人公的态度究竟是不是反讽评家一直争论不休,笛福也在序言里反复强调此书有鲜明的道德教化目的,但小说毕竟以第一人称的口吻,细致刻画了摩尔内心的焦虑,男人对她的始乱终弃,妇女在婚姻市场上的可悲处境,以及促成摩尔以美貌为资本、以欺诈为武器、一步步迈向道德沦丧的客观环境;作者甚至还给她安排了一个相当不错的结局,让她悔过自新,在北美弗吉尼亚殖民地发财致富,安享晚年。而海蒂犯下失贞和弃婴的大错,却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相比于18世纪,19世纪的英国社会对女性提出了更严苛的伦理要求。为海蒂抱屈的人不少,尤其在观念远为开放的现代社会。厄格洛(Jennifer Uglow)言辞激烈,说海蒂在爱略特手里 *annihilated*,意思是给“毁灭”“糟蹋”“废掉”了(*qtd. in Rignall* 7)。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也不满爱略特对海蒂的处理:“海蒂直到路上的最后一刻,在抛弃孩子之前,她一直都是一个主题,但在那一刻之后,她成了一个需要忏悔和皈依的对象”(173)。另一位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古德(John Goode)同样为海蒂喊冤,他在那篇富于真知灼见的文章中指出,海蒂本来可以成为异化的杰出个案研究,仅仅由于她的虚荣心,爱略特就将她变成了道德的矮子,被逼入孤立和疏离的绝境;其实海蒂触犯的不是人性或天性,而是由男性制定的道德合宜律(Hardy 28)。奥斯汀(Zelda Austen)指出,在多数女权主义批评的眼里,像奥斯汀、勃朗特和爱略特这样的作家都甘心做了文化神话的牺牲品,因为她们缺乏前瞻性的视野,让笔下的女主人公除婚姻之外没有别的实现幸福的途径;而爱略特塑造的女性,凡“逾规破矩”的常有灭顶之灾,譬如海蒂、玛吉、关德琳等(550-51)。奥斯汀面对这类批评,给出了相当有力的反

驳,但对“逾规破矩”的说法却有暗暗认同的意味。巴雷特(Dorothea Barrett)的解读更耐人寻味:她认为作者其实未能使我们疏离海蒂,正因为“未能”,读者便可以视海蒂的力量为无意识颠覆的产物——爱略特原来的目的是要拔高黛娜、贬低海蒂,结果等她把故事讲完,读者禁不住要质疑黛娜,为海蒂辩护。巴雷特甚至愤愤不平地指出,小说把海蒂描写成了“弗兰肯斯坦式的怪兽……叙述者对她缺乏同情”(43-44)。

可见为海蒂喊冤,替她辩护,视她为“逾矩破规”者,虽不能说一以贯之,却也是一种应和颇多的批评。这些评论值得推敲。海蒂真的被冤枉了吗?她作为女主人公,为何在作者和评家之间产生如此大的分歧?爱略特对她到底持何种态度?

完美太太的幻梦

海蒂自幼寄居于叔叔波塞的霍尔农场,故事开场年方十七,正是桃李年华,出落得貌美如花。她一心盼望的,是成为完美太太。完美太太,英文为 perfect lady,其实就是贵妇梦。这一提法是借自西方已有的研究。维奇努斯(Martha Vicinus)给文集《忍受并缄默》(*Suffer and Be Still*)写导言,论述19世纪中等阶层女性与公共领域分离,命名其为“维多利亚时期的完美太太”。照历史学家珀金(Harold Perkin)的说法,“完美太太”是“彻底有闲,彻底像花瓶,彻底无助和依赖他人,除了诱发他人羡慕和生儿育女,再无别的作用”(159)。撇开话里的揶揄不论,我们不难体会完美太太的要义:美貌,有闲,有人养。这观念的发生,实乃脱胎于18、19世纪英国中等阶层对于贵族社会的攀附心理。他们眼馋上流人士凡事有人代劳而不必亲力亲为的安逸生活,于是依样葫芦,刻意模仿贵族和绅士有闲的生活方式。男子既然要为生活打拼,不可能得闲,那么就让太太女儿们代理休闲,“完美太太”的理念由此而兴。这理念不单风行于中等阶层,连底层社会也颇受熏染。笛福笔下的小摩尔·弗兰德斯虽然是茕茕无依的小孤女,只能寄身于慈善学校,却也打小做着贵妇梦;而这类慈善学校的教育目标,竟然也是培养“像舞蹈学校那样文雅高贵”的女孩(10)。海蒂是另一个典型,她幻想亚瑟娶她后“不会愿意让她再干活的。他会想看她穿着漂亮衣服,薄底鞋,白袜子,说不定两侧还绣着花。他一定很爱她……他会想娶她,使她成为一位高贵的太太”(165)。

完美太太其实是近代以来才出现的理念。随着英国社会进入工业革命时期,家与厂(作坊)逐渐分离,中等阶层女性的地位发生了真正意义上的蜕变,她们多由原来与丈夫同进退、共甘苦的生产者转变为不事生产的消费者。女性同工作的分离,责任减弱,造成社会地位发生变化。新体系下诞生的这类女性,在责任上的地位远不能同在旧体系中相提并论(Clark 38)。由于家庭与生产分离,家务不再产生经济效应,导致家务劳动持续贬值。一部分中等阶层女子将琐碎、耗时、费力的家务交给廉价的劳力打理,自己则过起闲散、安逸、无所事事的生活。这也正是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在《有闲阶级论》(*The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里所描述的丈夫在商界打拼、太太“代

理休闲”和“炫耀式消费”的社会图景。让妇女固守家庭，还同上升中的中等阶层有意打造自己的身份、强化与平民的阶级区分有关系。劳动，不管是工厂做工、农场务农，还是帮佣、缝纫、洗涤，这些粗活都是卑贱的、不体面的下等人的工作，有身份的太太小姐们千万不能染指。工作领域的性别区分同时也是阶级区分的反映。

从生产领域集体撤离的女性向名媛贵妇的生活看齐。发迹的中等阶层也可以锦衣华服，使得原先可以通过服装轻易区分不同阶层的状况发生了改变。历史学家克拉克(J. C. D. Clark)指出，这个时期的英国仍然是贵族掌握领导权，自由与等级制并存；贵族及其生活方式不但引领着时尚，而且代表了“品味、风度和道德”。就此克拉克援引了1763年的报纸：“眼下风行一时的对上流社会的风度的模仿，已经在下层社会的上层人士中间传播得如此之广，不用几年，也许我国就完全没有平民了”；还说仆人也不得不“在地下室过他们的上流生活”(269)。这自然带有嘲讽的意味，却反映出真实的社会现状。在社会结构中居于顶端的有闲阶级，其生活方式和价值标准被等级较低的阶层争相仿效，“每个阶层的成员总是把上一阶层流行的生活方式当作理想的体面生活，并竭力争取达到这个理想的标准”(Veblen 59)。可见当完美太太的想法不是个体的现象，而属于18、19世纪英国社会流行的庸俗成功学的一部分。

18世纪的女性主义先驱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对此有清醒的认识。她在《为女权一辩》中批评了“目前流行的、关于女性角色的观念”，认为它“有悖于道德”，锋芒所指，正是摩尔与海蒂心目中的“完美太太”。她这样写道：

尤其是女性，都想成为贵妇，整日无所事事，东游西逛，漫无目的，因为她们也说不出一个目的来。但是有人可能会问，除了轻松自在地闲逛，女人还需要在社会中做什么呢？你总不会要求她们都去养些小傻瓜，记录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吧？不！女性当然可以去学习医学，成为医生或者护士。……如果教导有方，她们也可以从事各种职业……无须再为生存而结婚。(238-39)

爱略特将《亚当·比德》的故事设定于1799年，《为女权一辩》发表于1792年，几乎是同一时期。可是，等到爱略特提笔写作的时候，由于英国社会性别区分更严格、女性家庭角色更固化、法国革命后政治保守主义回温等原因，以沃斯通克拉夫特为先导的女性主义陷入了低潮。1855年，爱略特撰文讨论沃斯通克拉夫特与富勒(Margaret Fuller)的立场，指出自1796年以后《为女权一辩》像被打入了冷宫，几乎六十年没有再版，知道它的人越来越少，而富勒的著述在英国也少有人问津。文章援引了上面这段话，并进而评论道：“如果男子不肯鼓励女性培养自立与独立的精神，他们将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可见爱略特认同沃斯通克拉夫特对贵妇梦的批评，对她提出的帮助女性走出困境的方案也深表赞同：“唯一的出路是制定更公正的法律，让女性拥有更广阔的活动领域”，让她的天性“有充分发展的可能空间”(Selected Essays 336-37)。两年

后,当她开始创作《亚当·比德》时,完美太太的形象想必仍然在她脑海中震荡,回响,发酵。

美与自恋的陷阱

故事发生的时代,正处于英国近代工业社会的蓬勃发展期。因商业繁荣、经济发展,普通民众的购买力得到提升,社会等级在弱化,身份界限也日趋松动,阶层与阶层之间有了流动的可能。但这种流动主要发生在中上层社会、尤其是贵族与工商业阶层之间;底层想要攀升到中等阶层,进入体面社会,其实并不容易,何况是一个没有任何资源可言的农家女子。海蒂想当完美太太,除了普遍的风气熏染之外,她还有其他农家女孩所没有的先天优势——长得特别美。

爱略特形容海蒂之美,是一种 *distractingly pretty*,摄人心魄的美,让人见了就分神。海蒂出场时有一个象征性的动作——照镜子:“她常常趁着舅妈转过身去,盯着自己在光亮桌面上映照出来的可爱影子……也可以在松木长桌上方的架子上的锡盘里,或者在总像玉石一样闪亮的炉旁铁架上照见自己”(80-81)。将一切能反光的物体表面变为自我欣赏之镜,这是一个超级自恋的形象。自恋作为危险的陷阱,女人、尤其漂亮女人,相比于男性更容易陷入。美国评论家桑塔格(Susan Sontag)在《女性美:压迫还是力量之源》里指出,“女性被引向美丽的过程,实际上滋长了自恋主义,强化了她们的依赖感和幼稚心理。”古希腊人崇尚美,这是众所周知的,可是美在古希腊代表的是“一种美德、一种出色”;后来人们受基督教、尤其是新教的影响,将美丽从优秀品质中流放出来,“使它成为一种异化的、任性的、肤浅的诱惑”,由此而生内外之分:优异只是内在的道德,美丽仅属于外表,而且常常是女性的外表。海蒂汲汲营营的,正是这“异化的、任性的、肤浅的诱惑”。美貌可能成为资本,亚瑟跟海蒂调情,说他相信她“美丽的胳膊不是干这种重活的”,海蒂一准是相信的(94)。

美丽是一种力量,但正如桑塔格所言,这也是女性悲哀的一面,因为它是“女性被怂恿去寻求的唯一力量”。貌似主动的力量其实并不主动,甚至成为女性的软肋,因为美丽“不是一种行动力而是一种吸引力”;又因为美丽与生俱来,由不得人自由选择,所以美丽天然地带有被动性。海蒂当然不可能看到这一点。她清楚自己的魅力,也清楚这魅力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权力。在吸引与被吸引的权力关系中,她常常处于主动和控制的一方,这让她很得意。她不爱亚当,也不会考虑嫁给他,“世间没有什么可以诱惑她走这一步!”(109)但她不能容忍他移情别恋,爱上那个叫玛丽·伯奇的女子。假如亚当有几个礼拜不来霍尔农场,海蒂就会用一番心思将他诱回自己的罗网,犹如操纵一套牵线木偶或一袭纸鸢。可悲的是,这主动和控制不过是风中之影,水中之月,是一种主观的假想与虚构,根本经不住性别与阶级现实的轻轻一戳:沉溺于幻想的海蒂其实无力超越性别身份与阶级身份的被动性。爱略特用“卖弄风情的专制”

(coquettish tyranny; 109)形容海蒂,与其上述1855年的文章中所引富勒的一段话遥相呼应:“女子不谙生命的价值和目的,却专事培养一种自私自利的卖弄风情(selfish coquetry),热衷于追逐微末的权力(petty power)”(*Selected Essays* 334)。这个按语也回响着沃斯通克拉夫特在《为女权一辩》中表述的论点:“女性确实通过不正当的手段攫取权力,她们自己做出或鼓励不端行为,显然丧失了理性赋予她们的地位,不是成为卑下的奴隶,就是成为无常的暴君(tyrant)”(117)。海蒂追求的权力微末空幻,缺乏积极的因素,一旦环境发生改变,她就无从立足立身。女子不论是作为内在于自己的观察者,拿男性的眼光来看自己,还是作为被观察的对象,被当作一道风景或一个尤物,皆无可避免地具有被动性。

桑塔格对于美的反思,并非现代才出现的观念。早在18世纪末,沃斯通克拉夫特就在《为女权一辩》中表达了谨慎戒备的态度,提示美的观念可能隐含的性别陷阱和诱惑。在她看来,人们对于美的看法其实是包含性别偏见的,“女子被男性偏见引入了歧途,认为美就是一个女子臻于完美的标志,而在世俗的观念里,女性美仅仅指其容貌形体之美;男性美却可以与心灵才智相关”(146)。她指出,社会上通行男人为理性而生、女人为感性而生的观念,女人若想获得权力,需假手妩媚和软弱,即蒲柏所谓“因缺陷而美丽,因软弱而可爱”(137);而历史上的作家,无论是学富五车的弥尔顿,文采斐然的卢梭,还是写操行书教女儿立身处世的格雷戈里博士,均醉心于宣扬女性美貌的特权;女子受了这类言辞蛊惑,往往迷了心智,不知美貌盛极时的女皇待遇只是空洞的景仰,一朝容颜不再,景仰自然消散无踪。若美貌不足依凭,那女性凭什么才可立身?沃斯通克拉夫特以为,惟理性才可作为托付未来希望的稳固基石。她将那些依恃美貌的女子比作“被囚禁的笼中之鸟,除了搔首弄姿,装模作样地在栖木上跳来跳去,什么也做不了”(130)。这个比喻被爱略特借去,描述海蒂不懂黛娜,看待她“就像是一只小小的栖木鸟,看燕子低掠,望云雀高翔,而自己却只能在枝头跳跃”(155)。爱略特认同前辈,认为对于女子来说重要的是美德,而非美貌。美貌是一种被动的力量,美德则是积极的力量,可以蓄积主动的能量,使女性摆脱依附与被动的地位,作为一个人立起来。沃斯通克拉夫特与爱略特提倡的美德,不是恪守传统的女德,而是建立在理性基石上的人类共有的美德。她特别说明:“我希望告诉大家,品德比优雅更重要,无论对于男性还是女性,最值得赞美的追求都是获得成为一个‘人’所需要的品质。”她进而建议,女人不要被那些传统界定的女性特征——如“软弱而优雅的心灵”“极度的敏感”“甜美温顺的举止”等——束缚了手脚。她还反对将大量的时间与精力耗费在“粗浅的才艺”上,迎合“关于美貌的轻浮观点”而放弃“发展身体与心灵力量”的女性教育模式(76-77)。

象征海蒂存在的镜子有多重的作用,既呈现海蒂的美与自恋,又暗示一种空幻。而自恋的女子一旦将兴趣局限于自我、将自我与一切混同起来,就像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所说的那样,“既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也不能衡量自己”;她自认为极其重要,“但其实她接近不了任何重要事物”(476)。爱略特描写海蒂的心理,频频使用虚拟语

气,诸如“仿佛”“指不定”“好像”之类的语汇反复出现:“仿佛是河神向她求婚,指不定哪天就会把她接到神奇的水下宫殿去”;“指不定哪天她会成为贵夫人”——海蒂无法为她那些“飘忽无形的期望”找到具体的形象(148)。她之不能理解自己和他人原因,从客观讲,是她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只是一个单纯的农家姑娘,连小说也没有读过一本;从主观看,是她固执地局限于自我的世界,无意也无力走出自恋的陷阱。而迷恋自我的女人,再引一句波伏娃,“不考虑和他人建立任何真实的关系”,“从而失去对具体世界的控制”(492)。

活成一座孤岛

在充满诱惑的照镜仪式中,自恋的海蒂陷入麻木,造成了对他人、对真实世界的排斥。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在《理解媒介》中指出,“自恋”与“麻木”在词源上其实同出一源:“唯有借助麻木和堵塞感知通道,神经系统才能承受这种强度。这才是那喀索斯神话的含义。这位少年的形象,正是刺激的压力造成的自我截除或延伸。作为一种抗刺激机制,他的形象产生泛化的、难以觉察的麻木或震撼”(45, 47)。海蒂身边虽有照顾她的亲戚,有爱她的亚当,有关心她的黛娜,她却生生把自己活成了一座孤岛。波塞太太说海蒂“像粒干豌豆,什么也粘不上去”(369),正是批评她冷漠无情。

海蒂的心硬,有几处最突出。比如她收到亚瑟的信,梦碎后迅速转向亚当,几乎没有痛苦的过渡,甚至没有一丝犹疑。当不成人人羡慕的完美太太,还可以做巧匠亚当的体面妻子,这是海蒂的思维逻辑。另一处是在亚当父亲的葬礼上,海蒂与亚瑟林中相会后,渴望在礼拜日的教堂里见到亚瑟,而他却没有出现。海蒂在葬礼上将自己打扮得花枝招展,这是相当不顾及他人情感的行为。奥斯丁笔下的爱玛,因为对邻居贝茨小姐出言不逊,召来奈特利先生好一通责备,说她如此对待看着她从小长大的邻居,是举止“荒唐”,行为“失礼”(327)。《亚当·比德》的故事发生的年代同《爱玛》庶几相近,同样也在民风淳朴的乡村,可以想象,海蒂的行为也会被认为很不像话。

无情或缺乏感受(feeling),“天性中缺乏任何热情的、舍己献身的爱”(Adam Bede 172),是酿成海蒂悲剧的一个主观原因。而感受,在爱略特看来,是“善的根基”,是“一切美好事物的根本原则”(qtd. in Pinney 134-35)。感受不仅关乎善与道德,也关乎智力与理解力;既是一种情感,也是一种知识(高晓玲 5)。以感受为基础的同情或者说共情,是爱略特极为看重的一种能力,在她笔下同情与想象的能力密切相关。黛娜的“同情心和想象力经常相互作用,两者都愈益加强”(173)。海蒂缺少这种替别人感受的能力,所以她的想象力也肤浅。谈到海蒂的想象力,小说用的几乎都是贬义词,有时形容为“狭隘”“偏狭”“愚昧”(her narrow bit of an imagination, narrow circle of her imagination),有时描述为“孩子气的幻想”(168, 365, 341)。

从小说对男主人公亚当·比德的描写,也可见出爱略特对于同情这一品质的特别重视。亚当勤劳、敬业、自立、正直,几乎完人一个;唯一的缺憾正在于同情心不足,这差点成为他获得幸福的致命障碍。他性格过于刚硬,缺乏柔软和包容,信奉“上帝帮助那些自助的人”(52),容不得别人“不顾可预见的后果,明知故犯”(228)。一方面,亚当认识到,“宗教除了概念以外还有别的东西。教人们行正道的,不是概念——是感受”(198);另一方面,又对别人的缺点没有耐心和悲悯。作者让他的心弦紧紧绑定在意志薄弱、误入歧途的海蒂身上,只有当他看到心爱的人面临悲惨命运时,其同情心才真正被触发,因他不但要分担对方“错误的外在后果,也要分担其内心痛苦”(229)。这正是爱略特推崇的德国哲学家费尔巴哈(Ludwig Feuerbach)在《基督教的本质》里所说的,“没有同情,便不能设想爱,但是没有同悲共苦,便不能设想同情。”爱略特将德文的 Mitleid 译成 suffering in common,即“共苦”“共患难”之意(Essence 21)。

小说里的次要人物亚瑟是地主乡绅,同手艺人亚当一起,与海蒂的情感纠葛构成故事的核心情节。亚瑟在意志力和心力两方面都有缺憾,是一个意志力薄弱的人。他想到了海蒂可能遭受的非议,想到了波塞一家无比珍视、看得像宝贝一样的好名声,想到了倘不自重,不仅佃户不会再敬重他,连他自己也会痛恨自己。可真正事到临头,他又禁不住诱惑。他给自己找借口:“一个人下了决心,还是不知不觉做了错事,不该受到苛责”(187)。牧师欧文一语道破这借口的苍白:任何不当行为都有无情的后果,而且往往不只是牵涉到我们自己。

古德批评亚当之于海蒂的爱,是一种“物化的性引力”,并且说这种吸引力“同社会地位提升一道”,替亚当营造了美好的愿景(qtd. in Hardy 33)。这是颇富洞见的解释。可是,亚当为了与海蒂建立亲密关系,愿意付出多年的辛劳,表明其感情纵然建立在物质的基础上,却绝非单向的占有,而是包含了主体间交往中非常重要的对海蒂人格的尊重。真正将情感物化的是亚瑟。海蒂的亲吻甚至委身,这于一个女人最独特、最有个性的东西,亚瑟竟视之为小事一桩——大不了他可以弥补,用物质和金钱去弥补。爱略特细致刻画了亚瑟对海蒂的热情余烬未熄,必须放手又难以放手时的内心活动。在意识的层面,海蒂是异己,是不同阶级的女孩,他不可以爱上她,因为绝对不能同她成婚;但在无意识的层面,海蒂的魅力不可抵挡,她是亚瑟的欲望对象,是他想亲近的目标。海蒂于亚瑟,是“逢场作戏的感情”,是“闲来无聊的小事”,是他娱乐自己的方式(*Adam Bede* 140-41)。亚瑟利用了他的阶级身份来诱惑海蒂。

在表现为同情心的心力上,亚瑟也有很大的缺陷。表面看他很慷慨,“如果他骑马横冲直撞,不幸碰断了谁的腿,他付得起一笔优厚的抚恤金;如果他碰巧毁了一个女人的生活,他会买高价的糖果,亲手包好,寄给她作为赔偿”(136-37)。这是要命的资本逻辑,或者说占有逻辑,因为无论什么都可以拿钱来赔偿。一旦用钱来衡量一切,事物那特有的价值也就被抹除了。断腿撕心的疼痛,不在亚瑟的考虑之内;一个女人的生活也可以同糖果完全等价。这行为其实暗含一种麻木不仁,可亚瑟毫无意识,总

之他赔了,就心安理得了。他对自己的人品还信心满满:唐尼桑恩不可能做出卑鄙、怯懦、残酷的事来。这是亚瑟自己的话,也是乡亲们普遍抱有的看法。金钱的逻辑就是这么霸道的对等交换。正如西美尔(G. Simmel)在研究现代文化中的金钱时所指出的,当金钱“越来越成为所有价值的绝对充分的表现形式和等价物”时,它就导致了“对具体事物的超越”,导致了金钱万能的原则:“对价值进行确定、衡量、计算,将质的价值化约为量的价值”(13)。亚瑟与人交往遵循这一原则,他对海蒂的爱——如果说有爱的话——和喜欢,也没有脱离这个原则。

费尔巴哈还在《基督教的本质》中指出,人的本质是理性、意志和心:“一个完善的人,必定具备思维力、意志力和心力。思维力是认识之光,意志力是品性之能量,心力是爱。……真正的存在者,是思维着的,爱着的,愿望着的存在者”(《本质》31)。《亚当·比德》里的主要人物显然各有缺憾:亚当缺的是心力,亚瑟缺的是意志力和心力,海蒂则各方面皆有不足。她沉迷于完美太太的观念,麻木自恋,最终走向了悲剧的命运。有论者将海蒂与哈代笔下的苔丝相提并论,其实两人有根本的差异。苔丝是悲剧人物,而海蒂只是悲剧事件中的受害者。悲剧是把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你看,而悲剧人物的灾祸如果要引起同情,如黑格尔在《美学》中所说,“他就必须本身具有丰富意蕴和美好品质”(288)。海蒂很幼稚,别人把她当孩子,她自己也执着地要当孩子,所以她任着小性子,依恃自己的美貌,不思考,不计后果,也不愿承担后果地任欲望牵着自己盲目朝前走。爱略特刻画海蒂反复用一个词——“小小的”:她的饰物、乐趣、心愿、心智、想象力、梦幻世界,甚至连她的计划、计谋和讨好,都是小小的。

个体与群体的悲剧

可是,海蒂并不因其“小”而变得凝滞与扁平,反而是小说刻画得最丰满的女性人物。她的际遇构成故事的焦点,牢牢吸引着读者的阅读兴趣。爱略特有道德的关怀,却没有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对海蒂口诛笔伐,也没有将她简化成文学作品中惯常出现的女性类型如贞女、慈母或荡妇等。某种意义上,这是一部教育小说,爱略特的笔端含蓄、同情与悲悯,写一个没有受过教育、心胸狭隘的农村姑娘如何受庸俗成功学的吸引,一步步误入歧途,走向毁灭。海蒂的悲剧有个体的责任,也有不可忽略的社会成因。

爱略特希望揭示,海蒂反映的问题不是她一人独有,而同普遍的社会风气相关。首先,自恋不是海蒂一人的深渊,是人性共有的弱点,正如她在《米德尔马契》中所说,“我们大家生来处在精神的愚昧状态,把世界当作哺育我们至高无上的自我的乳房”(203)。人人都有自恋的倾向,海蒂在某种意义上代表了普通而普遍的人性。她的危险在于,不做任何努力去克服自恋的倾向,反而把它推向极致,最终把自己逼入绝境。

其次,完美太太的观念,是当时通行的社会价值观的一部分。在当时的人看来,成功意味着金钱、地位和值得尊敬,好的生活就是拥有这样的成功。所以,男子要发奋做绅士,女子要争当贵妇人。《亚当·比德》向读者表明,庸俗的成功学对于一个单纯女孩会造成怎样的毒害:“海蒂没受过什么教育,不过是一个单纯的农家姑娘。一位双手白皙的绅士,对于她就像是奥林匹斯山上的天神,闪着奕奕光彩”(110)。农家女子,见着一个少爷对她格外青睐,很可能会爱上他,几乎是不由自主。海蒂的虚荣心,有其社会根源。

再次,严苛的性别观与道德观对失足女形成极大压力,是造成海蒂悲惨命运的另一个原因。我们说海蒂把自己活成了一座孤岛,亦可说她是被迫活成了孤岛。令海蒂感到孤独无助的,恰恰是她最亲的人。爱略特的忠实读者、美国著名作家亨利·詹姆斯眼光敏锐,指出波塞一家讲求的“清白体面和纯洁笃实”为海蒂的悲剧埋下了伏笔(qtd. in Haight 50)。这个体面,也是海蒂要勉力维持的,哪怕流浪异乡的时候她也“保持一副骄傲自主的神情,晚上选择一个像样的地方过夜,早上起来打扮齐整,镇定地上路”(417-18)。波塞一家是大佃户,请得起雇工,家里还有三个女孩做帮手。佃户相对于地主,地位低等,然而波塞夫人能够义正辞严地驳回老绅士的无理要求,依赖的正是自身的体面、辛勤劳作和好名声。可是,体面的道德观也有狭隘和不容错的一面。他们犯不起错。波塞一家一旦收到退佃通知,就有可能面临沦落济贫院的风险。海蒂一听到“教区”两个字就不寒而栗,因为教区在名声上和“监狱”差不多。这里的教区,查《牛津英文辞典》可知,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由牧师管辖的教务行政区,而专指执行贫民事务的贫民教区,即可以抽取单独的贫民税、可以设立单独的管理专员的地区。18世纪末开始,英国严格限制政府对贫民的救济津贴,在济贫院设立残酷的苦役制度。济贫院形同人间地狱,其条件之恶劣、待穷人之不人道,在狄更斯的笔下、尤其是《奥利弗·退斯特》中有细致、生动、深刻的描写。

霍顿(Walter E. Houghton)认为,崇尚体面的“维多利亚人常以极端憎恶有时甚至是惊悚的口吻谈论罪恶……最细微的错误,一旦被视为俗世精神有可能借以潜入灵魂的裂口的楔子,遂演变为大奸大恶”;他还援引莫尔(Hannah More),指出基督徒理解自己与上帝的关系时,几乎没有“错”的概念,一切皆为罪愆,皆为对造物主的冒犯(232)。然而,正如亚当·斯密所言,每个等级社会同时存在“两个并行的不同的道德体系:其一可以叫作严格的或严厉的体系;另一个叫作自由的体系”,或者说“放纵的体系”。他对此做出了经济学的阐释:“对贫民而言,轻浮的恶习永远是毁灭性的灾难”;相反,“放纵与挥霍并不一定使上流人士败落”(转引自克拉克 254-55)。故而,严苛的道德观通常针对的只是中下层民众,上流社会并不受其影响。在这阶层的分野之外,还有一个斯密没有揭示的性别区分:女子一招错则步步错,一失足成千古恨,社会给她们的生存空间实在是狭而又狭,所以像海蒂这样的农家女子就面临着双重的不公正。诺顿(Caroline Norton)说,一旦涉及情事,“女人的错被当成罪,而男人的罪连错都算不上”(qtd. in Lambourne 374)。男人有可能全身而退,女人却要被社会抛弃。中

等阶层的道德容不得任何的僭越,对于波塞一家,海蒂的失足使波塞和他父亲感到家门受辱,“全家蒙受了羞辱——永远也洗不干净的羞辱”;这啞心的羞辱感“赶走了一切其他感觉”,使平素宅心仁厚的波塞对海蒂“没有怜悯的余地了”(449)。波塞和海蒂都是痛苦的,但是体面的观念使得他们抛弃亲情,隔离亲人,让两人的伤成了各自钻心的痛。痛苦完全丧失了社会性,变成必须由海蒂独自承担、孤独面对的事实,这也加深了她的悲剧,加速了她的覆灭。

无情或缺乏感受,是酿成海蒂悲剧的一个主观原因。可是,爱略特深知海蒂的悲剧有个体的责任,也有不可忽略的社会原因。因此我们看到,无论是左翼的还是女性主义的批评,即所谓爱略特不够同情堕落女子的境遇,让一个弱女子来承担原本应由社会承担的责任等指责,其实是失之偏颇的。而那么多评论替海蒂喊冤,本身就是饶有意味的现象,它表明现代社会其实更接近海蒂的自恋而不是黛娜的同情。我们所处的当下,是一个数字媒体盛行、大数据大显身手的自恋时代。自我宣传、自我美化甚至自我炫耀成为随处可见的景观。什么都可以说,什么都可以被展示,什么都可以夸奖和点赞,我们仿佛获得了从未有过的自由。但这自由其实是具有欺骗性的假象,因为它以自我为中心,哪怕有群体,也是趋于同质化的群体,很容易将他者排除在外。将自由利用到极致而丝毫不知限制、不顾及他者的做法,其实不是真正的自由,而只能是自恋。正如格洛伊斯(Boris Groys)在《走向公众》里所说:现代人的焦虑是一种自我设计的焦虑。这设计“关心的根本问题不是我如何设计外部世界,而是我如何进行自我设计,或者说我如何应对世界设计我的方式”(40)。如何走出自恋的陷阱,借由同情走向他人,或许是我们仍然可从爱略特的小说中获取的思想资源。□

参考文献【Works Cited】

- Austen, Zelda. "Why Feminist Critics Are Angry with George Eliot." *College English* 37.6 (1976): 549-61.
- Barrett, Dorothea. *Vocation and Desire: George Eliot's Heroines*. London: Routledge, 1989.
- Clark, Alice. *Working Life of Women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London: Frank Cass, 1968.
- Defoe, Daniel. *Moll Flanders*. New York: Oxford UP, 1971.
- Eliot, George. *Adam Bede*. Ed. Margaret Reynolds. London: Penguin, 2008.
- . *Selected Essays, Poems and Other Writings*. London: Penguin, 1990.
- Feuerbach, Ludwig. *The Essence of Christianity*. Trans. George Eliot. California: MSAC, 2008.
- Haight, Gordon, ed. *A Century of George Eliot Criticism*. London: Latimer Trend, 1965.
- Hardy, Barbara, ed. *Critical Essays on George Eliot*. London: Routledge, 1970.
- Houghton, Walter E. *The Victorian Frame of Mind, 1830-1870*. London: Yale UP, 1957.
- Lambourne, Lionel. *Victorian Painting*. London: Phaidon, 2010.
- McLuhan, Marshall. *Understanding Media*. London: Routledge, 2007.
- Perkin, Harold. *The Origins of Modern English Society*. London: Routledge, 2002.
- Pinney, Thomas. "The Authority of the Past in George Eliot's Novels." *Nineteenth-Century Fiction* 21.2

- (1966): 131-47.
- Prior, Mary. *Women in English Society: 1500-1800*. London: Routledge, 1985.
- Rignall, John. *Oxford Reader's Companion to George Eliot*. Oxford: Oxford UP, 2000.
- Sontag, Susan. "A Woman's Beauty: A Put Down or Power Source." Wheelersburg LSD. Web. 20 March 2021.
- Veblen, Thorstein. *The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 London: Oxford UP, 2007.
- Williams, Raymond. *The Country and the City*. New York: Oxford UP, 1973.
- Wollstonecraft, Mary. *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Men and 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 Cambridge: Cambridge UP, 1995.
- 爱略特:《米德尔马契》,项星耀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Eliot, George. *Middlemarch*. Trans. Xiang Xingyao.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2006.]
- 奥斯丁:《爱玛》,李文俊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Austen, Jane. *Emma*. Trans. Li Wenjun et al.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2005.]
- 波伏娃:《第二性》卷2,郑克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 [Beauvoir, Simone de. *The Second Sex*. Vol. 2. Trans. Zheng Kelu. Shanghai: Shanghai Translation, 2014.]
- 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荣震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Feuerbach, Ludwig. *The Essence of Christianity*. Trans. Rong Zhenhua. Beijing: Commercial, 2010.]
- 高晓玲:《“感受就是一种知识!”——乔治·艾略特作品中“感受”的认知作用》,载《外国文学评论》2008年第3期,第5-16页。 [Gao, Xiaoling. "Feeling is Knowledge!": Cognitive Effect of Feeling in George Eliot's Novels." *Foreign Literature Review* 3 (2008): 5-16.]
- 格洛伊斯:《走向公众》,苏伟等译。北京:金城出版社,2012。 [Groys, Boris. *Going Public*. Trans. Su Wei et al. Beijing: Jincheng, 2012.]
- 黑格尔:《美学》第三卷(下),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Hegel, G. W. F. *Aesthetics*. Vol. 3 (Part 2). Trans. Zhu Guangqian. Beijing: Commercial, 1997.]
- 克拉克:《1660—1832年的英国社会》,姜德福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Clark, J. C. D. *English Society 1660-1832: Religion, Ideology and Politics during the Ancient Régime*. Trans. Jiang Defu. Beijing: Commercial, 2014.]
- 西美尔:《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顾仁明译。上海:学林出版社,2000。 [Simmel, G. *Money, Sex and Modern Mode of Life*. Trans. Gu Renming. Shanghai: Xuelin, 2000.]

责任编辑:鲁余